



汉语广论文丛

● 主编/查振科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

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文学复译是一种文化积累

品味文学翻译

翻译的文化社会学观

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出翻译大家

许 钧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主编/查振科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

许 钧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许钧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1

(汉语广论文丛)

ISBN 978-7-5039-3155-0

I. 生… II. 许… III. 翻译理论-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6942 号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

著 者 许 钧

责任编辑 金 燕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a.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155-0/G · 61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关键在于为翻译正确定位（代序）

多年前，曾拜见季羨林先生，就翻译问题向他讨教。那次谈话的内容后来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为题发表在1998年《译林》第4期上。最近翻阅《光明日报》，无意间看见了李景端先生《听季羨林先生谈翻译》的文章。细读之后，颇有些感慨，有些话觉得不能不说。

感慨之一，是在季老与李景端先生的谈话中，有的话题是季老谈了再谈，呼吁了再呼吁的。季老为什么对翻译问题这么重视？为什么会一次次就翻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呼吁各级领导重视翻译，关心翻译？我觉得，关键在于季老对翻译的作用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有着正确的定位。关于翻译之作用，在我看来，中国也许没有谁比季老的认识更深刻全面了：“翻译对于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老对翻译的这一认识是在对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点考察基础上得出的。这段话，实在太重要了，我在各个不同场合多次引用，因为谈翻译问题，必须要从提高对翻译问题的认识开始。不然，谈不到点子上。

感慨之二，是季老对翻译现状和症结所在看得准而又准，但问题却总是悬而未决。十几年前，针对翻译质量问题，季先生就在《书与人》杂志发表文章，对当时

翻译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用了“危机”两个字要大家重视。他认为，翻译可以在文化交流中起大作用，但作用可以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要看翻译本身能否站得住脚。翻译首先有个道德的问题，有个风气的问题。翻译什么？怎么翻译？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在与笔者谈翻译问题时，季老说：“我们要选择翻译对我们中华文明有益的东西，还要把我们中华文明的精华介绍出去。现在的翻译风气不好，有的翻译很不负责任。曾经有一位同志，把他翻译的东西给我看，中文倒还不错，可一对原文，问题太大了，许多原文都没有读懂。理解错了，匆匆翻译过来，会有什么效果？这种翻译态度应该批评，现在看来，翻译界这种情况不是少数，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对原文不负责任，怎么能对读者负责任呢？这是一种欺骗。从文化交流方面来看，把别人的东西都介绍错了，这怎么交流？所以我说这样下去，是一种危机，必须注意。”要解决这种危机，翻译界本身要“自省”，出版界要“把关”，社会各界要“关心”。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健康的批评风气，翻译危机看来很难克服。

感慨之三，是我们国家现行的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指导思想和翻译学科的设置，很难造就季老所说的“职业翻译家”队伍。我知道，季老提出设立“国家翻译奖”，不是目的，他看重的是其象征意义，是想借此形成一种“理解翻译、尊重翻译”的良好社会氛围。实际上，我们国家目前的“全民学英语”和“把英语等同于外语”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很不利于“翻译人才”的培养。季先生提出的“翻译的生态平衡”的观点，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确实应该注意到，目前，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在这一方面，“英语”的日益国际化看似为交流提供了某种便利，但实际上是在削弱着处在弱势地位的一些民族文化。殊不知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便意味着其文化的消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不能以牺牲民族语言为代价，仅仅“用英语”去谋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相反，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坚持使用与发扬中国语言，同时，培养更多的翻译人才来满足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学科的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

听季羨林先生谈翻译，我们应该想到的，恐怕不能限于翻译本身，它事关我国

的对外文化交流；事关中华文明的发展；事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是否能闪耀更为灿烂的光辉。有了对翻译问题如此的定位，季老提出的解决翻译问题的一些对策，如设立“国家翻译奖”，制定翻译规划、翻译政策，加强翻译教学与翻译队伍建设，以及规范翻译市场管理等等，也许才有可能慢慢得到重视和逐步解决。翻译之轻重，有关翻译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探索。

前言

查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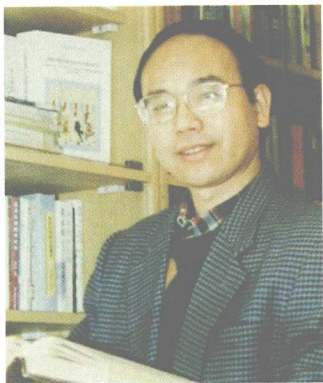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为鲜明的文化特征，一种语言的成长史包含着这个民族文化密码——语言与文明进步的关系。一个民族语言所显示出的智慧、创造性与丰富性，与这个民族在文明的所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程度成正比。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巨大融合力量，它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语言对民族的凝聚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他要完成的统一内容其中就包括了文字。走向极端，酿成了焚书。然而，统一文字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因为在历经春秋战国之后，各国的文字和书写方式都有了很大不同。

在中国学术史上，音韵学和训诂学都是关于语言的显赫一时的学术。到了上世纪初，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从语言——白话文那里找到突破口的。语言革命就这样成了整个社会革命的先驱。语言在约定俗成中产生，在发展中积累、沉淀并规范化起来；又在新的约定俗成中丰富，并继续被规范。新的生活内容——社会产品、观念和生活方式，需要新的词汇和表达式来进行表达、沟通。语言不可能一成不变。检索三十年前报刊所使用的语汇，再与今天比较，就会发现，变化是令人骇异的。

但是，语言又不能不遵守成规。成规让我们交流变得便捷，我们享受着成规。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新产生的语词、表达式如滔滔洪流呼啸而至，漫过语言大地，成规被肆意侵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朝菌不知晦朔，螳螂不知春秋，新的还未被沉淀，顷刻就被弃之如敝裘，潮头依然前进。在这个语言的洪涝中，很多人陷入了迷惘与困惑。如今，在用书面语来表达的语言使用中，汉字的使

用数量似乎越来越少。绝大部分的书面文本使用的汉字非常少，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汉字具有强大的组词能力，而另一方面，是否又可以说汉语语词的丰富性正在消退？

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而对汉语研究来说，恐怕也是最寂寞的学术之一吧。我们每天使用着我们的语言，而对它的现状却熟视无睹。汉语热正在很多国家兴起，这些国家的人们期待着通过汉语与我们发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联系。虽然我们并不指望与英语一较高低，但我们的的确确首先要让汉语真正成为一门有魅力的语言，纯洁她、发展她，使我们自己以及热爱汉语的世界各民族朋友在汉语中共同感受人类和谐。



许钧，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大学顾问教授，并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法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科学文献委员会委员，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 META、BABEL、《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译林》、《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外10余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通讯编委。已发表法语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170余篇，著作7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主编和合作主编《法国中篇名作精品丛书》、《现代性研究译丛》、《夏多布里盎作品精选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巴别塔文丛》、《杜拉斯文集》和《法兰西书库》等大型丛书或文集，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名士风流》、《邦斯舅舅》、《中国之欧洲》（上、下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翻译论》等作品，先后10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

目 录

关键在于为翻译正确定位（代序）	001
-----------------------	-----

翻译问题面面观

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002
翻译的哲学与宗教观	010
翻译是有限度的	013
主体意识与“私我意识”	017
翻译不可能有定本	019
怎一个“信”字了得 ——需要解释的翻译现象	024
“不忠的美人”辨识	029
关于翻译的“风格”	033
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小议	035
译文的美及其他	037
余光中的“‘的’的不休”说	040
法国的文学翻译面面观	044
翻译与社会	050
翻译家谈翻译四题	054
文学复译是一种文化积累 ——我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065
思考应该是自由、闪光与多彩的 ——《翻译思考录》代前言	068

中国文化：不可抵挡的力量

——毕基埃先生谈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译介	073
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	079

译书人谈书

流亡之魂与知识分子的良知

——读《失却家园的人》	086
揭开“公共舞台”后的真实世界	
——《日常生活文化译丛》序	094
观察历史真实的“碎片”	
——《西方文明进程译丛》序	097
流亡之梦与回归之幻	
——论昆德拉的新作《无知》	099
在善恶之间：人性与魔性的交织与倒错	
——读《桤木王》	110
解读中国古代文人的悲秋情怀	
——读郁白著《悲秋：古诗论情》	122
品味文学翻译	
——读《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有感	125
“遭遇”莎士比亚	129
译可译 非常译	
——谈翻译之道	134
“信达雅”没有过时	138
粗糙、失误还是缺乏警觉？	
——谈张承志对傅雷的“批评”	141
汉语的境况令人担忧	
——从《汉语的危机》谈起	147

翻译文化与社会观

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	152
翻译价值简论	165
“异”与“同”辨	
——翻译的文化观照	177
翻译的文化社会学观	
——兼评《翻译文化史论》	190
翻译动机、翻译观念与翻译活动	201
忠实、叛逆与再创造	
——也谈译者身份认同	214
文化多样性与翻译的使命	229

有关翻译的对话与访谈

给文学翻译一个方向	许钧 袁筱一	240
译书天下事 得失寸心知		
——关于《红与黑》中译本的对谈	赵瑞蕻 许钧	249
关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翻译的对谈	许钧 韩少功	257
语言总在找寻唯一	许钧 罗望子	264
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出翻译大家		
——许钧教授谈文学翻译	田志凌 许钧	276
内审以自强：一个翻译家的省思		
——专访翻译家许钧教授	李南 许钧	281
翻译家是孤独的人：《无知》译者许钧访谈	鲁刚 许钧	289
关于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		
——许钧教授访谈录	穆雷 许钧	292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		
——许钧教授访谈录	朱竞 许钧	299

翻译问题面面观

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

有关翻译的问题，学术界终于开始有人严肃对待了。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内，翻译的话题，好像一直是翻译家的事。而翻译家，由于更多的精力用在实践上，谈论翻译，自然而然都局限在技的层面，讨论最多的是怎么译。

近 20 年来，情况有了改变，搞哲学的、符号学的，研究历史的、文化的、文学的，还有语言学家、作家们，对翻译问题似乎都有一点兴趣。诸如翻译本质，翻译的可行性，翻译的作用，翻译的思维过程，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翻译的道德等等，这些有关翻译的问题，看来都是绕不过去的。于是，在国际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声音：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恩贝托·埃科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题为《寻求沟通的语言》的演讲，他宣称：“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翻译是可行的吗？”（《跨文化对话》卷四，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第 4 页）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明确指出：“翻译问题是比较文学的中心问题。”（《文艺报》2000 年 8 月 29 日，第 3 版）印度学者泰贾斯维尼·尼兰詹娜在 1992 年出版了《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主义语境》一书，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要“把译文置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9 页）。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更是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美国学者勒菲弗尔 1990 年主编了一部论文集，叫《翻译、历史与文化》，在导论中明确指出：“翻译一直是决定世界

文化发展方向的主要影响力量。”

在国内，我们也发现不少学科的学者开始把注意力投向翻译问题。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指出：“而今比较文学的翻译学科不能不面对语言差异极大的不同文化体系，文学翻译的难度大大增加，关于翻译的研究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当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乐黛云《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发展趋势》，《文艺报》1998年9月1日，第2版）哲学家苗力田在汉译《亚里斯多德全集》总序中这样写道：“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民族为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精神营养所经常采取的有效手段。这同样是一个不懈追寻，无穷探索，永远前进的过程。求知是人之本性。”德国哲学研究专家倪梁康从根本上提出：“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读书》1996年第4期）

一

研究翻译，对“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翻译一词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里，实在也是很特殊的：它既可指翻译活动的主体，即翻译者；也可以指翻译的行为和过程；还可以指翻译活动的结果，即译文。“翻译”一词集三种含义于一身，主体、行为与结果，交织在一起，更使翻译的界定和翻译的研究显得复杂。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也谈到德语中有许多词都含有翻译一词的基本意义，所以“一部翻译理论史实际上相当于对‘翻译’这个词的多义性的一场漫长的论战”（《翻译学——问题与方法》，祝珏、周智谟节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10月版，第19页）。

我们暂且先取“翻译”一词的动态意义，即翻译行为。《辞海》中有“翻译”这个辞条，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拿今天的观点看，这一个解释，显然是不全面的，还不如唐代经学家贾公彦所解：“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如今，许多学者都试图对翻译一词加以界定，比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有几十种，界定的角度不一。美国语言学家奈达说：“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

言。”这显然是一个语言学途径的定义，涉及的内容是丰富的。在我看来，翻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从思到言，就是翻译。这包括了“理解”与“表达”两个方面。思的特征是理解，言是表达，是理解基础上的创造。两者密不可分。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艺术作品的本源》等文中多次谈到翻译问题。在谈到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词语的吸取时，他这样说：“从希腊名称向拉丁语的这种翻译绝不是一件毫无后果的事情——确实，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它是无后果的。毋宁说，在似乎是字面上的、因而具有保存作用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希腊经验向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渡。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由这些词语所道说出来的经验，即没有继承希腊人的话。西方思想的无根基状态即始于这种转渡。”（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版，第234~244页）按照孙周兴的解释，海德格尔的这段话的前半句，主要说明“翻译不止是字面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后半句则进一步强调：“罗马——拉丁思想对希腊思想的‘翻译’只是字面上对希腊之词语（复数的 Worter）的接受，而没有真正吸收希腊思想的内涵，希腊的‘话’（单数的 Wort）。”这里，涉及到了思与言的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求真。限于字面的翻译，能否传达词语及词语之后的“真”？在我看来，思与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翻译所固有的“求真”的本质，应该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实质上，哲学家，特别是语言哲学家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对翻译研究是根本的，那就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翻译，就其根本，是翻译意义。限于词语表面的翻译，能表现词语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和文明空间吗？能传达词语的真值吗？这个问题，倒给翻译提出了一个本质的要求：翻译，决不应该是字面层次的语言转换，而应是思想的转渡，是文化的移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埃科为何会把翻译的可行性当作当代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明白了“意义”的探究对翻译是第一位的。

翻译是可行的吗？哲学家贺麟是这样理解翻译的：“从哲学意义上说，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流活动（communication），其中包含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文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

道之间的关系。”他还说，某些神秘直观论者认为这种交往活动是不可能的，可他认为“意与言、原本与译文，应该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贺麟《谈谈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贺麟对翻译的这一认识，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至今在中国，翻译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简单转换，一种纯模仿的技术性工作，不需任何创造性。这种观点，直接源自于人们对世界、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简单化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可行性是深信不疑的，认为人类的经验、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因此，人类的交流是可行的。但是，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却对翻译的万能提出了质疑。如新洪堡学派的加西尔认为语言不是一种被动的表达工具，而是一种积极的因素，给人的思维规定了差异与价值的整体。任何语言系统对外部世界都有着独特的切分。语言系统沉积了过去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向未来的人提供一种看待与解释宇宙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并非仅仅由人们通过语言去理解与想象；人们对世界的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中生活的方式已经被语言所界定”（转引自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伽利玛出版社1963年版，第46页）。这一观点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捕捉？操不同语言的人对同一的现实的认知是否一致？他们之间是否可以达到真正的交流？这也就在理论上给翻译提出了一个个需要解答的问题：不同语言的转换，能否传达对世界的不同切分和认识？一门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不走样地在另一种语言中传达出来？人类经验是否有其普遍性？若没有，以交流为目标的翻译是否可以进行？

二

上文中提出的有关翻译本质、意义与交流的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在理论上，翻译确实存在着种种障碍，但人类是不能没有交流的，交流也是不能不以理解为基础的。从实践看，只要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人们需要交流，就不能没有